

追光文学巨匠

纪念茅盾诞辰125周年

文学史对于茅盾的文学成就的论述,与1945年6月中共在重庆举行茅盾先生50岁寿辰和从事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有关。当时,中共重庆机关报《新华日报》连续编发为茅盾祝寿的专刊,发表了由廖沫沙起草、周恩来、王若飞修改并审定的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以及王若飞代表中共的祝贺文章《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辰》。在这两篇文章中,频繁出现“路程”“历程”和“道路”这样的概念。特别是王若飞的文章,明确提出“茅盾先生为中国的文艺探索出一条现实主义的现实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究者非常重视茅盾的现实主义道路问题,20世纪50年代茅盾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两部专著——邵伯周先生的《茅盾的文学道路》和叶子铭先生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都不约而同地将茅盾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定位,与“道路”概念联系起来。樊骏先生曾在1960年第2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专题论文《两本关于茅盾文学道路的著作》。茅盾本人似乎也认同这种概括,在晚年出版文学回忆录时,将书名定为《我走过的道路》。所以,将茅盾的文学业绩和社会实践,与“道路”问题形象地联系起来,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历史内涵。

►茅盾《读稼轩集》手迹 资料图片

1 呼吁文学创作者在广阔的社会天地中,感受和体验普通百姓的生活

茅盾的文学道路,与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结伴而生。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向壁虚构、矫揉造作、粉饰太平的虚假文学形成对照。五四时期,茅盾与郑振铎等发起“文学研究会”,他们强调“血与泪的文学”,目的是要文学创作者正视社会现实,将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重新建立在一种批判的基础上,也就是要彻底打开创作者的社会视野,拆除创作者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屏障,让文学创作者在广阔的社会天地中,感受和体验普通百姓的生活,反对附庸风雅、吟风弄月;强调写实手法,而不是向壁虚构的编造手法来进行文学创作。茅盾的这种意识,顺应了五四新文学潮流的时代需求,来自他的文学实践和社会实践,具有强烈的在场感。

1921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时,大量的投稿都是无病呻吟的滥情之作,不管社会痛痒而完全沉浸于个人世界。对于这样的文学创作,茅盾极不满意,他写下《春愁创作坛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等文章,予以批评。他倡导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希望以此来改变这种文学现状。

与此同时,从1920年开始,茅盾与陈独秀等人结识,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茅盾是50多位最早的党员之一。而且,在茅盾的影响下,弟弟沈泽民和他的同班同学张闻天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核心成员和领导者。1925年至1927年,茅盾到广州、武汉参加国共合作,从事实际政治活动,担任

拍摄于1959年的《林家铺子》,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影片,在最初并未受到广泛关注。茅盾原作、夏衍改编和水华导演的耀眼标签,未能赢得特别青睐。幸运的是,经典终会被再次提起,佳作必将被重新提及。1995年,原广电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评出中国电影90年10部优秀影片,其中就有《林家铺子》。

经历过五四运动、中共创建和五卅运动等重大事件,茅盾更加坚定革命理想和政治立场,善于用文字来批判现实黑暗,创作了大量的“社会剖析小说”。他在193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将笔触深入到中国现代小说鲜为关注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以江浙村镇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切入点,全景式地展现了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三座大山压迫下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再现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情境。作者关注的是更为隐晦且更为深刻的社会命题,努力向社会生活深处探寻,通过林老板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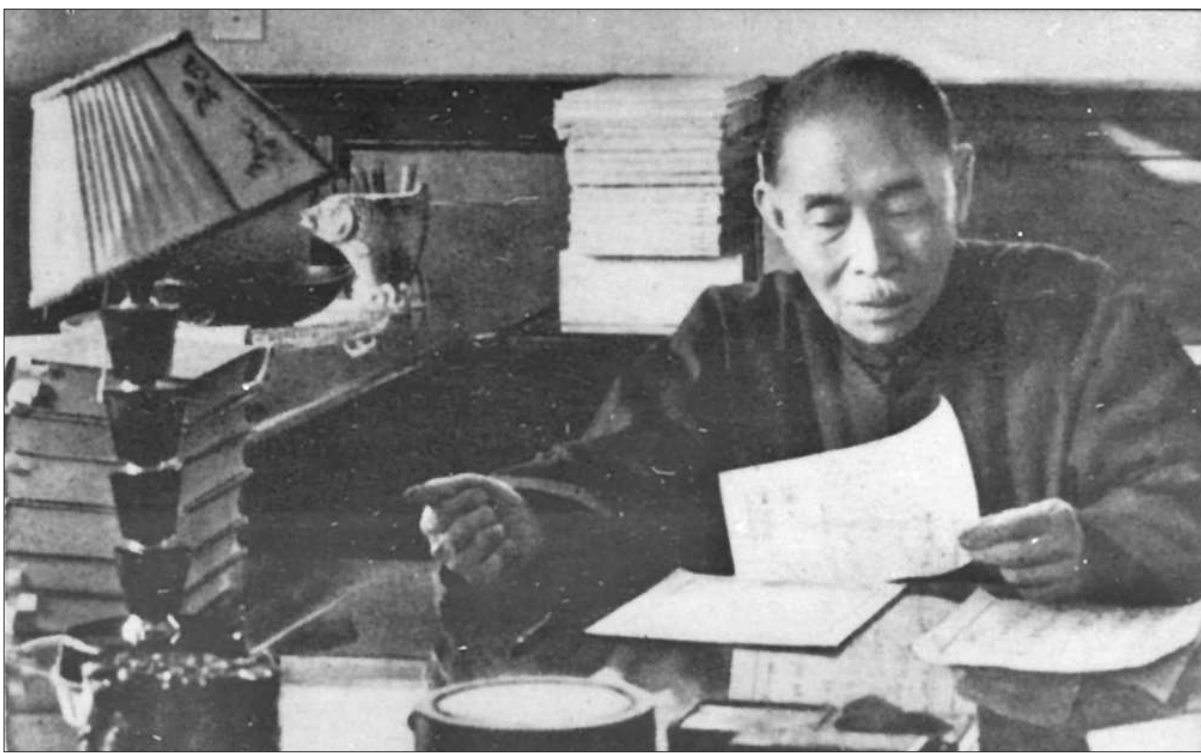
光的回响

具有的双重阶级属性强化了其命运的悲剧意味,也丰富了人物性格的多元面向。

夏衍关注《林家铺子》多年,最终成功地将文字语言转化为电影剧本。他深谙原作的真实况味和情感精髓,在保留原作创作理念的同时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恪守了批判力度和客观立场,将价值判断隐藏在画面、场景和人物行为中。林明秀在原著中是单向度的“林小姐”,喜爱东洋货却又害怕同学们的耻笑,不顾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而为自己添置新衣,抗日行为和抵制日货只是弱化为她买衣行为的简单诱因;在电影中,她的形象就较为丰满可爱,自觉地主动地走进那个时代

茅盾：闯出广阔而深邃的现实主义道路

□ 杨扬



晚年茅盾

资料图片

2 在描绘人物关系时,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和文学思考,触及关键

茅盾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中,像鲁迅、瞿秋白等,对茅盾的创作经验也是非常关注的。在致曹清华的信中,鲁迅肯定茅盾《子夜》的现实主义成就。瞿秋白在《子夜》出版后,连续发表了《〈子夜〉与国货年》和《读〈子夜〉》,对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予以积极评价。这些评价,不只是声气相通的文学援助,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学某些探索性尝试的鼓励和肯定。

当时,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表达左翼思想情感的作品并不少见。茅盾的《子夜》不同在于,作品传达的不仅是一般的、个人的感触和感受。如果说,巴尔扎克曾经许诺要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那么,《子夜》可以视为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变动的现实主义画卷和长篇史诗。其中各式各样的现代性格的人物以群像的方式,出现在小说舞台上。像银行家、实业家、军阀、政客、大学教授、交际花、医生、包工头、纺织工人和逃亡地主等,都是时代背景下中国都市里的特殊人物。他们以群体的方式,大规模地出现于作品系列中,这在以往作家作品中是不曾有过的。

而且,在描绘人物关系时,茅盾的

文学表现不是浮光掠影的,不是印象式的,而是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文学思考,极具特色,触及关键。以《子夜》对上海都市生活的把握为例,如何来揭示都市生活的灵魂,这一直是现代中国文学面临的重要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表现乡村生活,诞生了一批杰出的作家作品,而对于都市生活的表现,相对要弱得多。茅盾的《子夜》是少数几部在表现城市生活上获得成功作品,它对于都市生活核心内容的揭示,是准确、有力的。

在《子夜》中,他不仅表现20世纪30年代在旧上海,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的冲突,也表现当时金融资本、实业资本与中国政治、中国乡土经济的冲突。这样的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世界中独树一帜。茅盾或许不一定完全懂得当时金融交易的秘密,但当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出现冲突时,他看到当时实业资本的不堪一击。对于当时金融资本的运作规则,茅盾看到它与政治权势纠缠的一面,清楚地揭示出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金融巨鳄可以脱离政治力量的庇护,以及当时的政治权势要想在军阀混战的中国乱局中获得胜算,也需要财

团和金融巨鳄的支持。这样的都市生活,在茅盾《子夜》之前,从来没有入表现过,而后来的作家作品中也很难寻觅到这样的表现力度。

之所以有这样的独特性,可能与茅盾的经历有关,也与他的博学多识有关。因为很少有现代作家像茅盾那样,从踏上文学之路开始,就有着深厚而独到的生活积累,这使得他提笔书写相关的人物、故事时,很多细节和场景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另外,茅盾的文学知识的渊博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文坛曾经传言,茅盾熟记《红楼梦》,朋友宴席上随便抽取一章,他都能背诵下来。而他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也是数量惊人。批评家李健吾在《忆西谛》中就记录过茅盾早年认真研读西方文学批评史原著,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演进历史非常熟悉。另外,据统计,单单是《茅盾全集》收录的译文,就涉及40多个国家的200多部作品,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茅盾的文学积累之深厚。所以,广阔而深邃的现实主义道路,在茅盾的文学世界中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他多方面人生探索和无数知识的长期积累、融会的结果。

3 深入持久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潜心于长篇小说创作

20世纪二三十年以来,茅盾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一直在中国文坛发挥实际影响,不断有作家、评论家赞同他的观点,自觉接受他的思想影响。特别是1949年之后,茅盾一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职,创办《文艺报》《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报刊,对新中国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时他发表的批评文章就有100多万字。像创作过《李自成》的姚雪垠和写作《创业史》的柳青,在创作思想上,都服膺于茅盾的现实主义。

另外,像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小说家茹志鹃、陆文夫等一批实力派作家,都得到过茅盾的大力推荐。茹志鹃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我读茅盾先生的《春蚕》,我在这里看到的,仅仅是养蚕人的忧患辛勤和希望?是老通宝的忧愤、迷信、无情?是那河湾里飞驰出来的轮船?还是那大门关得紧洞洞的茧厂?……我想,我看到帝国主义吸血的针尖,怎样

伸入中国的每根静脉里,我看到那个时代的忧患。我不知道这是以小见大的手法,还是以大见大的手法,总之,我觉得一个数千言的短篇,竟能包含这样多、这样深的社会内容,这是我所羡慕,我想追求的。”

20世纪60年代,茅盾助推“中间人物”论,小说创作中产生一批兼具性格特征的“中间人物”。他们与当时文坛流行的“英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后来文学史的影响看,类似茹志鹃、陆文夫笔下的“中间人物”以及柳青《创业史》中带有“中间人物”性格特征的梁三老汉等小说形象,都经得住时间考验,至今还为读者所喜爱。这又从创作经验上证明了茅盾的创作影响。

1981年3月14日,茅盾在逝世前,写信给中国作协书记处,将自己的一生稿费积蓄捐赠给中国作协,希望建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励基金。中国作协接受建议,设立以他命名的长

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从1982年第一届评选开始,至今已经举办10届。4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文学价值也相应发生沧桑巨变,但茅盾的文学影响以“茅盾文学奖”这一特殊方式,潜移默化、深入持久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潜心于长篇小说创作,贡献出不少优秀的长篇作品。

对于茅盾文学观念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深深地吸引着当下的文学研究者。1983年成立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员遍及海内外。在新世纪,会员们不断有新的作为,不仅出版了60卷的“茅盾研究八十年书系”,而且也编选完成和出版了43卷本《茅盾全集》。上述现象说明,茅盾至今拥有着文学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他的创作是我们不断推进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源和价值参照。

(作者系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前行,此时的俯拍镜头正是“愈想愈仄”的视觉传达,纷落的雪花和催款人的叠化镜头加深了观众对他真实境遇的情感偏向。但是,当他遇到王老板时,因身份转变而引起的情绪转变,在俯拍镜头和仰拍镜头的切换中自然流淌,他俨然从欠款者的悲剧身份中暂时得到解脱,仰拍镜头中他显得决绝和强硬。场景的刻意安排、心理蒙太奇的独特运用和镜头角度的自由转换,有力地营造出林老板复杂的内心世界。

作为革命前辈,茅盾有对社会现状的呐喊疾呼;作为文坛学者,茅盾有对劳苦大众的悲天悯人。正是这双重身份,赋予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现实主义风格对其不仅是符号学意义上的仿真,更是社会学层面上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对小说《林家铺子》的核心叙事准确而巧妙地加以运用,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形成互文共释,成为观照现实的虚拟映射,成为了解特定社会的镜窗窗口。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青年编剧)

向社会生活深处探寻 ——《林家铺子》从小说到电影

□ 郝静静

太多的同情”。正是这种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深刻展现了那个“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更加凸显了规定情境中的悲剧氛围,更是对进步青年的全面刻画。

从这部电影中可以看出,茅盾的创作有着“文以载道”的文人风骨和“教化民众”的艺术担当,善于在冷峻、客观的风格中建构宏大的叙事视角和细致的社会分析。

茅盾原著的成熟为电影文学剧本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保证了影像化过程中的诗化风格和隽永悠长的艺术品位。他用细腻的文字,刻画了小资产阶级艰辛的心路。林老板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在被时代裹挟前行中有许多的身不由己,但也不能让观众对他“有

幕个人机遇,强化了林老板的心理描写和意识流动,原著中的价值判断通过读者的自我直觉来实现多义层面的文字解码。

夏衍和水华在电影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画面和蒙太奇语言,用“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创造充满独特寓意的视觉效果,在现实揭示和心理表达中无障碍穿梭。这种隐喻层面的视觉化再现,能让观众更加深刻地体味到茅盾先生参透社会本质的悲苦无助,也更能感受到渗透笔墨纸端的忧患之心。

林老板内外交困的心理境遇在“意象以尽意”的影像风格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向钱庄借钱未果,拖着“冷了半截的身子”在小巷中落寞

《光明日报》上的茅盾足迹

●1949年6月16日,刊发茅盾庆祝光明日报创刊“朝阳”创刊的文章《颂“朝阳”》,文章指出,中国现在是沐浴于朝阳之中了,历史展开全新的一页,中国这一轮朝阳,将把它的光明照射到东方乃至西方的每一黑暗的角落。中国人民翻了身了,人民将发挥出无限潜能的光和热。而“朝阳”这公开的园地一定也将反映这人民的光和热。

●1959年2月17日,刊发茅盾的文章《怎样评价“青春之歌”》,文章指出,“青春之歌”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离开今天有二十多年了。要正确地理解这部作品,我们就得熟悉当时的一切情况,特别是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情,这就会陷入反历史主义的错误。我们之所以肯定“青春之歌”,也因为它是没有反历史主义的毛病。

●1981年4月12日,刊发周而复的文章《永不陨落的巨星——痛悼茅盾同志》,其中写道,他平时躺在床上构思,想好了一段,便立即坐到椅子上,埋头一笔一毫仔仔细细地写,累了,哮喘了,不得不躺到床上去休息,稍微好了一些,又起来继续写,一天一般只能写几百字。他社门不出,虽然国内国外许多作家希望见他,他也很少接待一般宾客,用他晚年的精力锲而不舍地从事著述。

●1982年12月7日,刊发新华社消息《六部优秀长篇小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报道指出,六部优秀长篇小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这六部作品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东方》《李自成》《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

●1994年8月20日,刊发茅盾的文章《怀念茅盾》,文章指出,茅盾先生一贯赞成现实主义,他认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他又说:“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现国民性之能有真价值。”那时候,上海文坛上有不少“为艺术而艺术”或是自甘做象牙之塔里的作家。茅盾先生勇敢地提出这种论点,真是维护现实主义的坚定的战士。

●1997年9月28日,刊发魏泉琪的文章《走近茅盾故居》,文章写道:半个世纪过去了,但茅公留给我们的印象至今不泯:一套很普通的西装,一双很普通的皮鞋。五短身材,谈不上胖,但可以说是结实,近乎圆形的脸,不戴眼镜,目光睿智而有神,一张不算小的嘴角角分明。他没有讲稿,似乎也没有吸过一支烟……

●2017年1月3日,刊发孙郁的文章《关于茅盾的文学批评》,文章写道,茅盾大约借鉴了前人的思想,《小说月报》时期的文章,旧气已脱,新姿渐出,他写《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自己脱俗的、自然的、属于自己个性表达式的批评语言。他对那达夫主义的肯定,对冰心文本的欣赏,特别是对鲁迅文本的咀嚼和把握,鲜活而有质感,理论与诗意浑然一体,这时候茅盾的批评观有了西方同时代批评家的风采。

●2020年6月19日,刊发林传祥的文章《茅盾的书法》,文章指出,茅盾讲究书写的实用性或适用性,即让人看得懂,也让人看得舒服。从他的早期文章手稿看,他的书写敦厚质朴。他临“董美人碑”,“乱写中找到了窍门;他看“瘦金体”,虽“未学”,却心领神会;他自觉将两种书写融合,形成自己的个性。